

河津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河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封面 书名题字 董其武

33

农 业 经 济	河津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	董世英 (1)
	河津土地改革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周敬贵 (23)
	河津第一座机灌站建设始末.....	李作霖 (37)
	河津气象谚语.....	周敬贵 (42)
教 育 之 页	民族革命第九中学散记.....	薛广才 (49)
	解放战争时期的河津教育.....	郭裕如 (62)
	建国后至“文革”前河津教育大事记	县教育局编写 (70)
	河津扫盲工作回顾 (1949—1965)	武文考 (72)
河津工读中学办学琐忆.....	韩民英 (80)	
宗教沿革	河津天主教概况.....	中共河津县委统战部 (86)
往 事 录	记郭孟贤同志的革命活动.....	柴殿堂 (90)
	参加首都国庆二周年检阅典礼的回忆	柴仰冉 (99)
	绥远“九·一九”起义(续)	董其武 (106)
音容宛在 风范照人 ——纪念董其武副主席逝世一周年.....	张志津 (116)	
董其武拒贿除恶.....	张荣耀口述 李惠民整理 (121)	

历史的足迹	夏尧邱其人其事 刘荐璠 (123) 阎锡山九专署跨台记 刘荐璠 (130)
梨园话旧	蒲剧探源 (续) 墨遗萍 (134) 清末民初蒲剧艺人米子彦 焕青整理 (143)
明镜台	严禁赌 兴美俗 ——历代禁赌纪事 刘大卫 (145)
历史名人	唐初大将薛仁贵 李之杰 常治申 (147) 虓将白袍与唐太宗 墨遗萍 (153) 初唐诗人王绩 刘大卫 (176)
古耿文物	新出土的史家将相墓碑 董波 (184)
文化走廊	河津历代书法名家 (一) 高尚友 (190) 河津干板腔 杨玉林整理 (193)
艺文	游龙门山记 [明]薛瑄作 薛运生注释 (200) 河汾五贤咏 [明]薛瑄作 薛广才注释 (204) 婉烈士诗 (五首) 李尤白 (209)
文史札记	关于薛瑄弥留时赋诗的一点考证 原文熊 (213) 建议成立王通、王绩、王勃研究会 李尤白 (215)
名特产品	河津花生 生资 (216)
征稿启事 河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19)
	封面插图 上为河津县修仁村“白袍窑”中薛仁贵夫妇塑像；下为薛仁贵射雁滩，在今修仁村汾河边。

河津农业发展的 历史地理问题

田世英

本文阐述的地区主要为河津县、万荣县西北部和乡宁县南部，三地毗连，在农业发展上有连带关系。全文分地理概观、古老的耕作区、汉唐时期的粮仓之一、解放前耕作条件的蜕化和结束语等五部分。

一、地理面貌概观

在谈农业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以前，先概略地说明一下本地区解放前夕的地理面貌，以便分析研究。

这一地区在山西西南部，黄河及其大支流——汾河相会的地方。这里西渡黄河，便是陕西韩城市，自古是秦晋来往的咽喉，汾河流域西入关

中的主要津隘所在，侯（马）西（安）铁路也是经过这里通到西安的。

就地质构造上说 本地区是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所产生的块状断裂下陷而成的汾河地堑的一部分。由河津县治北望龙门山，断壁峭立，崖面清新，足证断裂的时期距今不久。断裂沿线，泉水潺潺，自古为本区农业发展提供了水源。据近人研究，这种“下沉运动最近仍在继续进行”①，而且是汾河新构造运动中的“强烈下沉区”②。地震频繁往往是剧烈的。就近年说，1959年夏季的一次震动，河津县治北面的崖壁崩塌，九龙头古庙墙垣倾倒。这是下沉运动继续进行的证据。

就地貌方面说，本区是汾河地堑最低平的一部分，也是山西省最低平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在海拔400米左右。地面普遍堆积着深厚的沉积物；然而各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细分之，可划分为四个副区：

（1）、黄河河槽区：在本区西部边沿。北起禹门口，南到汾阳雎遗址④，黄河两岸第一阶地之面，本地称为“黄河槽”。南北长约三十五公里，东西最宽处达十二公里。黄河水面宽度仅及河槽宽度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流部分时

而偏东，时而偏西，七、八年或十多年改变一次。河槽的大部分是泥沙沉积的洲渚沉地；其中最大的一块叫葫芦滩。遇到夏秋水大时，往往汪洋一片，洲渚尽没。耕地不及总面积十五分之一，而且常有“没有成熟，黄水漂没”之害。

(2) 黄沙岭区：黄河河槽以东，北起清涧湾，南抵汾河沿岸，是一带南北长达十五公里，东西宽约5—7公里的沙丘区，本地称为黄沙岭。“禹门口，风常吼”^⑤，尤其冬季西北风猛烈，黄河河槽里淤积的泥沙，水退干燥，被风吹到第一阶地上，便形成了沙丘累累的“黄沙岭”，沙丘逐渐向东移动，太阳、连伯、峻岭、西辛封等村的良田沃野，一部分被掩埋，一部分成为土壤瘠薄的“沙丘地”；许多清末民初的墓碑、石坊，有的被掩没，有的露出地面一两米。沙丘区栽培的果树常有树干埋没，枝条露出沙面的现象，有时由于沙丘移动，根部露出地面倾倒枯萎。除边缘地带种花生、栽果树——杏、柿外，绝大部分沙丘累累，弃置无用。

(3) 汾河河槽区：汾河两岸河漫滩和第一阶地到第二阶地的交界处，本地称为“汾河槽”，这是本地区最低平的地方。河漫滩的高度在海拔330米左右，第一阶地比河漫滩高五、六米。汾

河曲曲西流，入黄河口的位置常变动。大致说来，黄河主流偏西岸，入河口即偏南；黄河主流偏东，入河口即偏北⑥。汾河具有显著的半干旱区域河流的特性，洪水期和枯水期的流量相差在百倍以上。洪水量最大流量一般达2500秒立方公尺，枯水期赤脚可渡。夏秋季节，黄河水位高涨时，汾河的水往往溢出，两岸顿成水乡泽国。河水含沙量甚多，约为百分之十二点五，每年送入黄河的泥沙达五点六万吨⑦。河槽区的地下水位很高，第一阶地的水井，当春季干旱时期，井水面离地面仅五、六公尺。据当地老人说，有些井水原是“甜水”，近十年来却成了“苦水”。地面平铺着深厚的近代堆积层。这里的土壤大部分是盐碱土，天气晴朗的时期，盐碱外泛，不少地方像结了重霜一样。耕地不多，主要分布在第一阶地。广大的河漫滩，绝大部分生长着盐荐、芦苇和藿菜等耐盐碱的植物。

(4) 南北高(平)原区：从汾河河槽区第一阶地向南或向北行，爬过陡坡，便到了高出第一阶地六、七十米的第二阶地，本地称为“汾南高原”和“汾北高原”；实际上是两块高平原，高度约在海拔400米左右。地面坦荡，平铺着深厚的古代沉积黄土。在黄土母质上发育成的褐色

土，石灰质含量丰富，呈微碱性反应。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耕作，肥力较高，是今日本地区主要的棉、麦产区。只因降水较少（年降水量平均为438毫米），年变化大，灌溉事业不发达，容易发生旱灾，尤以春旱的现象最频繁。汾北高（平）原以北是吕梁山地，汾南高（平）原以南是孤山稷王山之地，分属夏县、万荣、稷山三县。

二、古老的耕作区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黄河滩地的荒废，黄沙岭的扩大，汾河槽的盐渍化以及南北高（平）原的干旱，对本区农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条件。但就历史上看，这里却是我国农业兴起最早地区的之一。据安特生考证⑧，远在采陶时期（约当公元前2000年以前），汾河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始种植，有了农业生产，后稷教民稼穡的地方，就在北区相距甚近的稷王山⑨。这固然是传说，但是这个传说的地点出现在这里，也足以表明本地区的农业兴起很早。古冀国建都在本地区东北部的冀亭⑩，祖乙迁耿的“耿”，不少历史考据学家认为在本地区的“耿乡”⑪。战国时代

建立的皮氏城，在今河津县治的西面。这些古代都邑出现在本地区，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当时这里的农业经济一定有了相当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屡犯皮氏^⑫，出师借口虽这样那样，争夺这块农业发达的土地却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这里农业兴起的早，固然和依山傍水、地形坦荡、土地深厚有关系，最主要的是劳动人民在数千年前治水工程的胜利为农业打下了基础。按禹贡九州，本地区属冀州。禹贡上说：“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壶口在本地区西北面，离河津县禹门口只有70公里左右。梁山及岐山在壶口以南，横跨黄河上，与本区北境的龙门山相毗连。岳阳泛指今日霍县东30里太岳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和本地区相临近。至于太原，就是包括本地区在内的汾河两岸以及中条山、霍山、吕梁山之间的许多平原而言^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几项治水工程都是在本区附近的地方进行的。治水工程完成了，自然“西河之东，东河之西，水土患平”^⑭。本区在“西河之东”，而且在治水工程的中部，很早以前就免除了水灾是可以想象的。王国维说：“河东之地自古未闻水患”^⑮。其所以“未闻水患”，和上面所说的治水工程分不开。这就为农业发展奠定了

基础。

水灾消除以后，人民便有了条件在这依山傍河、高平坦荡、土壤深厚的原野上开始种植。据历史学家研究，那时候我国北部的气候比较现在温热^⑯，对于栽培作物来说，自然是有利的。此后，在治水胜利的光辉传统之下，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兴起了利用水的农田水利事业。这又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汉唐时期的粮仓之一

前汉都关中，粮食不够用，“用卒六万人”，“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因为路程远，且“更砥柱之艰”，所以“败亡甚多而烦费”，很不经济。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宜余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足见本区所在的河东郡，不仅粮食足用，而且有余济京师。河东郡守番系更大胆地许诺皇上，如果本地区进一步发展了汾河、黄河灌溉工程，那末，不仅“砥柱之东，可毋复漕”^⑰，连三辅、弘农、上党、太原诸郡的谷也不用余了，仅本区所产就可以满足京师之用而有余。从这些记载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本区农产是相当富足的。

到了唐朝，粮食产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基地之一。开元二年，李唐王朝为了搜刮粮食，便在这里建立了“龙门仓”^⑯。以解放前夕本区的条件看，汉唐时期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基地之一，是令人莫解的。然就当时的耕作条件分析，不仅并不偶然，而且完全能。主要的因素是农田水利事业的空前发达和耕可地面积宽阔。

先谈汉朝时期本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据汉朝历史记载，本地区最早的大规模灌溉工程，是上面提过的河东郡守番系建议修筑的汾黄灌溉工程（亦称“番系渠”）。《前汉书·沟洫志》里说“穿渠引汾灌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遗弃地，民畜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上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据灌溉地区和当地传说推侧，这个工程的主渠在今日黄沙岭的东部边缘。从汾河下游开渠，绕故皮氏城下，经西辛封，北达清涧村；南过汾阴睢下，直通到蒲坂下的黄河，以灌溉黄河东岸的“故尽河遗弃地”。番系渠的渠道相当宽阔，事隔数百年，到了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依然可以看到“故渠尚存”^⑰。从番系渠分布的地区水利

之灌溉面积分析，渠成前，今日黄沙岭还是一带低平的“故尽河遗弃地，民畜牧其中耳”的一部分。不然，皮氏城干渠的水，隔着一带相对高度15—20米的沙岭，如何能灌溉“故尽河遗弃地”？如果干渠偏在黄沙岭以西，那末，灌溉面积大为减少，决达不到五千顷之数。再以“度可得地五千顷……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推测，这片“故尽河遗弃地”的土壤，还是相当肥沃的，决非今日的飞沙可比。因此，可以断定，汉朝时代的今日黄沙岭地区，并非沙丘累累，而是一片低平的、土壤相当肥沃的沿河草地。番系渠修成以后，黄河东岸的草地和河漫滩都成了耕作区。虽然，作渠前番系忽略了黄河主流的东西摆动问题（也许在番系以前黄河主流东西的摆动幅度不大，没有现在显著的频繁）。“数发，河徙移，渠不利”，但是，“久之，河东渠田废”。可见这里的渠田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渠田废了以后，依然没有让这块相当肥沃的土地荒废，给予善种水田的越人，在这里种植水田作物。越人耕种，尽管没有渠田的收获量大，但是总比较洲渚林立沙丘滚滚的、白沙茫茫的滩漠好得多。

汉朝以后，在三国、晋、南北朝、隋和唐的五个朝代中，河津地区的水利事业，以唐朝最发

达。灌溉南北高(平)原和汾河槽区的水利工程，几乎全是那个时代修建的。这并不是李唐王朝对河津地区农民生活特别关怀，而是因为山西是李唐的发家之地，唐朝第一位皇帝李渊曾在本地区所在的河东郡任抚慰大使。得了天下以后，进一步统治全国，必须粮秣充足，兵强马壮。山西是剥削粮秣最可靠的老地方，为了剥削的更多，当然要想出办法发展农业生产。就山西的条件说，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首先发展农田水利，因为这里的降水量比较少，而且变化大，不大可靠。山西农田水利事业大规模的活动，就历史记载的可靠次数统计，两汉统治的427年(公元前206—公元221年)中，共有4次，平均107年一次。三国、晋、南北朝和隋共历397年(公元221—618年)，共有六次，平均每66年有一次水利活动。到了唐朝统治的289年(公元618—907年)，共有32次，平均9年一次，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朝代的次数。从以上次数对比，更可看到李唐对山西水利事业的重视。还有，就我国关内18省气候的历代变化说，从三国到唐初是比较干旱的^⑩，这是发展农业的大威胁。李唐要保证老根据地的农业生产，也必须发展水利。

上述情况具体到本地区更为明显。因为河津

地区离当时的京都长安不远，是李渊的老地盘，又是一个古老的产粮区，当然会引起李唐王朝的特别重视。所以建国不久，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继位以后，本地区还兴修了瓜峪山堰（亦称瓜峪渠）、十石垆渠（亦称石垆沟）、马鞍坞渠、遮马峪渠等灌溉工程。据《山西通志》载：瓜峪渠在“县北三十余里，紫金山麓，西距遮马峪十里有奇，悬崖峭壁，水由石出。马鞍坞渠在马鞍坞山下，西距瓜峪三里，古树根下孔大如斗，清水涌出。”遮马峪渠“距县西北三十五里……由山峡出。”从上面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都是来自龙门山断层作用形成的断裂泉。从“孔大如斗，清水涌出”字样估计，当时的泉水是相当丰富的。这三个灌溉工程的灌溉区域相当大，北起各峪口下的冲积层，南到汾北高（平）原的中部，都可以收到灌溉之利。除了上述引泉水灌溉之外，唐朝时代还在瓜峪、遮马峪口修了许多道引“浊水”浇地的渠道。所谓“浊水”，即雨后沟壑水涨，因势导往田间的山洪。今日汾北高（平）上存在的所谓“涧”，例如大涧，即由当时引洪浇地的渠道发展而成。浊水浇地的区域比泉水灌溉的地方更大。就浊水浇地留下的痕迹估计，汾北高（平）原的绝大部分引浊水浇灌过。

深厚的沉积黄土层，肥沃的褐色土壤，坦荡的地
形，再加上劳动人民辛勤的引泉水、浊水的灌
溉，农产品的丰富不言而喻。赵宋王朝建立，对
于本区的文物制度有不少摧残废革，但对于瓜
峪、遮马、马鞍等渠道特别重视，“竖二碑刻石
图，置县厅”，以示永远遵守。从这里也可看出
三个灌溉工程的重要性。据《新唐书·地理志》
载：“河津县治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 坷渠，三
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又
据《山西通志》附唐书地理志山川图，十石 坷渠
在河津东北，汾河两岸。它是河槽地区引汾水灌
溉的主要水利工程。从“溉田良沃，亩收十石”
的词句看，当时这条渠道的收益很大，所以称为
十石 坷渠。开元二年李唐王朝在这里设龙门仓，和
十石 坷渠的灌溉有密切关系，亩收十石固然是引
水灌溉的成效，但也反映出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的。
如果当时的土壤像解放前一样，遍地盐碱，
即使灌水充足，也决不能达到每亩十石的标准。

此外，汾南高（平）原南部孤山和稷王山的
山麓地带，泉水也很丰富。唐初在孤山附近建万
泉县，就是为利用泉水发展农业而建治命名的。

四、解放前耕作条件的蜕化

如果把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的内容作一比较，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河津地区的耕作条件在蜕变。蜕变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而且是波浪式的过程，很难明确指出蜕变从哪一年开始。虽然总的形势看，本地区的耕作条件在唐朝以后走了下坡路。

先说灌溉工程的废弛。番系渠早已废弃，不用复述。亩产十石的十石垆渠，唐朝以后的历史也默默无闻，不知什么时候被汾河淤积的泥沙淹没了。灌溉汾北高（平）原的瓜峪、马鞍、遮马三渠和引浊水浇地的渠道，北宋时尚能承袭唐代的衣钵，但仅限于消极利用，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渠道年久失修，加上山地区的植被破坏，一遇猛雨，山洪暴发，不仅渠堰溃决，破坏了灌溉系统，而且冲毁了大片良田。例如元朝至元年间和大德年间，遮马峪渠浇干涧的一支，因“猛雨冲断，水落不停”，长期不能灌溉。再如明朝嘉庆十一年，西长大涧“由于山水暴涨，崩入黄河，冲出大沟，沉几百尺”，破坏了几百顷可以灌溉的良田沃野。山地区植被破坏的另一结果，是水源失去涵蓄，泉水大为减少。由于水道系统的紊乱，泉水的减少和统治阶级的离间，争水浇地，纠纷时起，更促进了灌溉事业的颓废。历代